



《毛澤東帝國》面面觀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李 福 鐘



毛澤東帝國(上)(下)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
編輯採訪小組編著；童長義
譯 / 書泉 / 9106 / 419元
ISBN 9576489350 / 平裝

自 1949年以來，臺灣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曾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受限於政治禁忌，以致於始終停留在「匪情研究」階段，並未形成自由開放的學術領域。所謂的「匪情研究」，不論其探討分析的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何種主題，結論必定推導到中共政權「暴政必亡」這一命題上來。簡言之，這是將學術工作拿來作為政治宣傳與對敵作戰的一種手段。

1987年政府開放國人赴中國大陸探親，開啓了臺海兩岸新的互動方式，加上臺灣隨即進入解除戒嚴與廢除動員戡亂體制的政治新時代，理論上過去有關中共課題研究的一切藩籬均已撤除。然而十餘年的時間過去了，國內目前所看到有關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術研究成果，大抵仍停留在對現實政經議題的分析上，至於其他層面，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作品，幾乎是乏善可陳。也因此，市面上能看到的中共問題出版品，要不是翻譯自國外，或者就是集中探討現階段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課題；至於歷史類作品，除少數一兩部真正嚴肅地從學術角度

出發外，大抵仍停留在「小說家言」的地步，只能歸類為歷史「演義」，權充茶餘飯後消遣的素材。

就此而言，甫由臺灣大學歷史系童長義教授翻譯完成的《毛澤東帝國》一書，無異彌補了臺灣目前市面上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籍相當欠奉的一個缺口——在通俗演義與嚴肅學術著作之間，讀者幾乎無從選擇的那一段空白。《毛澤東帝國》原名《毛澤東秘錄》，集結自日本《產經新聞》的長篇連載。雖說原書寫作體裁係針對報紙連載之需要，因而學術性的註釋、論證一概取消，保留的主要是戲劇性的故事內容，不過由於《產經新聞》原編採小組寫作時參考了為數眾多的最近10年中共官方出版物，下筆時務求言必有據，因而即使為了滿足一般讀者而將內文儘可能通俗化，全書在嚴謹度上依然保有一定水準。至少，在關鍵敘述與重大情節上，該書畢竟做足了無一處無出處、不徒託空言的工夫。

《毛澤東帝國》一書所涉及的主題，大致上是毛澤東生前死後約莫20年之間，中共黨內的重重大政治鬥爭。從1959年廬山會議對「大躍進」路線的爭議，到1978年華國鋒與鄧小平有關「真理標準」的攻防，這一段人民共和國歷史，恰好是中共黨內從極左的社會主義路線擺盪到如今走上資本主義路線的關鍵歷程。就這一主題而言，原書名《毛澤東秘錄》其實是有它貼切含意的。日文「秘錄」(hiroku)原本指的就是機密檔案、秘密紀錄之類。從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文革鬥



爭劉少奇，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幫」被捕，到1978年12月鄧小平所代表的元老派勢力擊垮華國鋒的人馬，這一連串中共黨內重大政治鬥爭的背後，原本就包含著極為複雜的秘辛內幕，作為歷史秘聞的素材，這二十年間的故事，先天上便具有吸引讀者的魅力。中文譯本書名改為《毛澤東帝國》，不知是否為了呼應多年前坊間有部以《鄧小平帝國》為名的書籍？其實《鄧小平帝國》一書之命名有其特殊的意涵脈絡，《毛澤東秘錄》原書名所蘊涵的「機密檔案」這一層暗示，似乎多少予以保留較為理想。

既然《毛澤東帝國》一書用意在於揭露從1959年到1978年間北京高層政治鬥爭之內幕，則其行文重點，難免必須擺放在極為繁複細微的人事問題上，尤其派系與派系之間、事件與事件之間，原本就極難梳理清楚的互動與傾軋。這樣的寫作方式有一種很大的風險，就是最終使整部書淪為政治鬥爭流水帳，令讀者陷入瑣碎的人物事件迷霧中而茫然無措。不過整體來說，《毛澤東帝國》編採小組在寫作過程中顯然就這一點費了不少心思，由於原書係為日本國人而寫，因而一開始便極有意識地避開了中國大陸類似出版品在這方面的普遍盲點。中國大陸既有的同類作品由於讀者群鎖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上，因而許多繁瑣的事件發展過程不得不愈詳實愈好，不如此便不足以吸引讀者的青睞。與此相反，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包括臺灣閱讀繁體字的讀者，先天原本就對中共數十年來的政治發展過程不是那麼熟悉，硬要生吞活剝那一串人名與事件經過，通常情況是書翻不了幾頁就倒盡了胃口。《毛澤東帝國》由於一開始就打算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滿足日本國民的需要，因而對於臺灣讀者群來說，恰恰撿到了便宜，就像量身訂作的一樣，原作者已先仔細作過篩選處理，這種去骨挑刺過後的「精選輯」，讓人讀來少了許多障礙，卻也不致於因陋就簡，或許是較適合本地讀者口味的一種寫作

方式。

像這種對中國大陸出版品進一步的整理加工，以符合本地讀者需要的前置作業，原本是臺灣的作者、編輯群所應從事的。只不過正如本文前面所言，臺灣長期以來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先天不足，這方面的人才至今仍如麟毛鳳爪，能夠提供本地讀者可信的、不受誤導的資訊的條件仍未成熟，某些直接轉換自簡體字版本的出版品良莠不齊，消費者要真想接觸到品質較好的相關書籍，還真只能碰點運氣。

就此而言，《毛澤東帝國》的出版畢竟是件難能可貴的事情，日文原作從龐雜的材料中抽絲剝繭所得的成果，確實有助於剛接觸這個領域的臺灣讀者，作為未來進入更圈圈密密的史事迷魂障的登門階。

不過由於《毛澤東帝國》一書的寫作係建築在中國大陸簡體字作者所形成的既有基礎上，因此亦難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籠罩；至少，目前中國大陸流行的對其共和國歷史的評價、人物的月旦、尤其是相關事物的臧否，本書基本上亦一併接收。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欠缺獨立觀點而只是引用官方說法，非常容易使涉及到的人物圖像變成戲臺上的臉譜，只剩下黑與白的對比，抹消了現實世界中極複雜的生且淨丑的真正面貌。最明顯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垮而家破人亡的原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現在幾乎都以「殉道者」、「悲劇英雄」的姿態出現，然而誰還記得，劉少奇在歷來中共黨內鬥爭中，也曾對別的同志落井下石，或根本就是為毛澤東的奪權立過汗馬功勞？忽視這樣的現實，就容易在行文時過份一面倒地表現出不必要的同情，結果搞錯了史實。

本書上冊第255頁，便犯了這樣一個不小的錯誤。書中提到劉少奇在1962年主持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俗稱「七千人大會」）時對廬山會議翻案，遂擅自做了如下的推論：「（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中，沒有對彭德懷助一臂之力，他的心裡一定曾經隱隱作痛」。



這段敘述彷彿把劉少奇和彭德懷劃在同一戰線，將兩人當作是志同道合的戰友了。這絕對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事實上是，劉少奇主持1962年（本書頁254誤植為1966年）「七千人大會」時雖然檢討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諸多的工作缺失，然而獨獨對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問題絕不留情。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宣達了兩點：一是彭德懷在黨內搞小集團，而且他還是高（崗）、饒（漱石）集團的主要成員；二是彭德懷有國際背景，他和某些搞顛覆活動的外國人有關。因此劉少奇在會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不能平反」。關於劉少奇這些對彭德懷落井下石的講話，後來中共官方編修《劉少奇選集》時，大抵上皆「消音」處理了。像這樣的例證，說明在研究中共史時，必須避免掉入一種戲臺臉譜式的「忠／奸」「善／惡」對比的刻板印象。不幸的是，官方在監修制式版本的史書時，通常偏好以這種方式來歸類歷史人物，尤其中共官方這幾年的出版品，總想藉這樣的圖像來建構某種「撥亂反正」的價值觀，其結果就是美化了某些人、同時也醜化了另一些人。《毛澤東帝國》一書係根據大量官方出版品寫成，所以亦免不了這個通病。

另外在逐譯工作方面，童長義教授顯係費過不少檢索比對的工夫，相當難能可貴。由於本書所涉事件、材料引用原本皆為中文，然而寫作過程中已將之轉換為日文，如今又譯回中文繁體字，這一轉一換過程中難免失真。儘管童教授費了不少工夫，不過某些誤

失還是難免發生，最明顯的就是引用書名上的錯誤。因為《毛澤東秘錄》原書所有引文皆已日語化，因此如何還原為原始中文書名，確實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問題是這項工作又不能草率將就，否則明明是同一位作者的同一本作品，譯出來的書名卻跟原書書名牛頭不對馬嘴，豈不尷尬。像是本書下冊頁123提到熊華源等人所編的《林彪反革命集團敗亡紀實》，真正書名應該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覆滅」與「敗亡」，從日文顯然很難判斷原中文書名用的是哪一個詞，像這種時候就只好盡可能把原書找到，再加以比對。然而以臺灣目前的圖書館藏，要做好這項工作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另外像是上冊頁170所引劉正德所寫的《我是劉少奇的秘書》一書，「劉正德」其實是「劉振德」之誤，正確書名則是《我為少奇當秘書》；頁84用葉永烈的作品《一九七八中國命運的大轉換》，正確書名是《一九七八中國命運大轉折》；頁96提到黃崢的《劉少奇冤罪事件始末》，應作《劉少奇冤案始末》。像這類瑕不掩瑜的小失誤，也許未來在本書再版時，能有機會作進一步更正。

整體而言，本書作為臺灣讀者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入門讀物，稱得上是不壞的選擇，如果能夠以此為起點，吸引國內更多年輕學子投入這一領域的研究，以期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共官方論述體系之外、更符合臺灣本土需要的學術研究傳統的話，未嘗不是美事一件。

◎